

潘重規先生八秩榮慶祝壽專輯

敦煌學

第十二輯

敦煌學會編印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II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7

論伯希和粟特文寫本二號之年月

吳 其 昱

巴黎圖書館藏伯希和粟特文寫本二號，爲一不知名佛經，大意勸人戒酒肉，文甚長，今存三至二十二葉，兩面書寫，每面有字三十一行左右墨書，共一千二百三十七行。每葉正面開始處有葉碼數字，長48.5公分，高14.8公分，厚紙，暗黃色，葉近三分之一處（約第十至十一行間）有小圓孔一，以便穿繩聯結各葉，小孔四週略留空白，即所謂梵夾 (pothi) 式。

此寫本之影本見 *Codices Sogdiani* 粟特文書〔影本〕，一九四〇丹麥哥本哈根出版，E. Benveniste 教授有此書羅馬字本，法譯、注釋及字彙，收入 *Textes Sogdiens* 粟特文書〔考釋〕，一九四〇巴黎刊行。

題記中有關年月問題部分，在書末1233至1234兩行，E. Benveniste 教授羅馬字本如下，今附漢文字譯。

1233行	'PZY	np'γšty	ZNH	pwst'k	'wy		
(字譯)	又	寫	冠詞(陰 複)	經書	指示詞(複賓)		
	γwmt'nčw	knōyh	'wy				
	長安	城	此				
1234行	γwt'w	βrγβ'r	'štyk	m'γh	28	srtyk
	帝王	(中國皇帝)	第三	月		日

以上字彙，除大寫字母組成之表意字 ideogram 外，均據 Benveniste 字彙。Benveniste 解讀漢譯如下：

『皇帝三月二十八日寫此經文於此長安城中』

文中有月日而無皇帝尊號年代，請先略論字彙，然後討論年月問題。

昱案大寫字母組成之字，見於 D. N. Mackenzie, *The "Sū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 London 1970 頁 46, 76 及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1976, 又頁 85, 148 M. N. Bogoljubov 等 *Sogdijskie Dokumenty s gory Mug* (Mug 山粟特文書)，第三冊字彙部分，一九六三莫斯科印行，今據以漢譯如下。

1. 'PZY, 連接詞「與」, 「及」, 「又」, 參閱I. Gershevitch, 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1954 p. 307.
2. ZNH 爲陰性複數冠詞。
3. 28 爲19之誤, 此寫本19葉數碼卽與此同。參 W. B. Henning, Selected Papers, II,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頁244, 亦以28爲19之誤。
4. $\beta r \gamma \beta' r$ 疑爲 $\beta' \gamma \beta w r$ 之誤。寫本w處正爲下行字筆劃所遮掩。又粟特字r與'字母近似。 $\beta r \gamma \beta' r$ 似應讀爲 $\beta' \gamma \beta w r$ 天子。英藏粟特文第二札, 第十一, 十六行有 $\beta \gamma p w r$ 中國人, 見 H. Reichelt, Die soghdischen Handschriftenreste des Britischen Museums (英國博物院粟特文寫本 [考釋], 第二冊, 頁12、14, 圖版II, 第11, 16行, Heidelberg 1931. Reichelt 書又有 $\beta \gamma$, 神、王侯, 參閱 Transactions of the Glasgow Oriental Society, viii, 頁25, Henning注。

阿拉伯語有 Baghbūr 或 Baghpūr 天子, 見(1)J. Sauvaget,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頁20阿文及法譯, Paris 1948; (2)Maçoudi, les Prairies d'Or, C. Barbier de Meynard本, 第一冊, 頁306, Paris 1861; (3)The Fihrist of Al-Nadīn, B, Dodge英譯本第二冊, 頁839, 紐約1970; (4)Marvazī Minorsky, 英譯本頁15, 阿文本頁3作 Faghfūr, London 1942。波斯文作 faghfūr, 如 Hudūd al-Ālam, Minorsky 英譯本頁 84, London 1937, 波斯文本 Tehran 1962 頁 61。參閱 Encyclopedia of Islam 初版, Leiden 1913-1934, 第二冊, 頁 38 FAGHFÜR, 及 Pelliot, Notes of Marco Polo, 第二冊, 頁652 Paris 1963。

5. $\gamma w m t' n \check{c} w$ $\gamma w m t' n$ 卽 Kumdan, 中世伊斯蘭及東羅馬作者用以指長安, 梵文亦作 Kumudana, 見 Bagchi, Deux Lexiques sanskrit-chinois (梵漢字彙二種), Paris 1927, 1937, 第一冊, 頁295, 875號, 第二冊頁349。

前舉 Hudūd al-Ālam 英譯本頁84, 波斯文本頁61; Marvazī 英譯頁25, 26, 阿文本, 頁13, 14; 參閱 G. Ferrand, 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ân en Inde et en Chine, Paris 1922, 頁77, 86, 92, 105及 M. 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par les Arabes et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 s. de l'ère chrétienne, Paris 1845

東羅馬史家 Theophylactus Simocattes (七世紀上半期人), Historiae, Leipzig, Teubner 本, 1887, 1972 VII 9, 有 Khoubdân 吳文作 Khomadân,

Photius引作Khoubdan, M. & M. Whitby英譯,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Oxford 1986, 頁192. 參閱 G. Coedès, *Texte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Paris 1910, Hildesheim 及 New York 1977 翻印本, 頁141-142。

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下方敘利亞文kwmd'n即Kumdān, 左起第三行末, 又右側左起第三行等處。參閱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II, 1: *La stèle de Si-ngan-fou*, Paris 1984, 頁55, 60.

H. H. Schaeder 引伯希和粟特文寫本二號之題記, 討論 γwmt'nčw, 見其所著 *Iranica*, 2. *Fu-lin*, 頁45起, Berlin 1934, 又引 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文中長安亦作 γwmd'n, 見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44, 3 Helsingfors 1930, 頁36。

最後討論年代問題, 彙案: 資治通鑑貳貳貳, 肅宗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制, 去尊號, 但稱元年, 以建子月爲歲首, 明年(762)四月甲子制改元(寶應), 復以建寅爲正月, 舊唐書拾肅宗本紀, 唐會要壹均同, 是時郭子儀率蕃漢兵收復長安, 正攻取洛陽、回鶻援軍當有粟特佛教僧侶, 至長安後, 卽選譯漢文佛經爲粟特文, 或抄寫粟特文佛經, 以求功德, 參閱杜甫北征詩, 見杜工部集貳, 四部叢刊本:

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鶻, 其王願助順, 其俗善馳突, 送兵五千人, 驅馬一萬匹。

或問何以不稱元年? 或許是時僅有數月, 不足一年, 故逕稱皇帝三月……日, 卽762年陰曆三月十九日(陽曆四月十七日)。

最後將粟特文有關部分改訂如下, 並附漢譯。

1233行	'PZY	np'γšty	ZNH	pwst'k	'wy	
	又	寫	冠詞(陰, 複)	經	指示詞(陰賓)	
	γwmt'nčw	knōyh	'wy			
	長安	城	此			
1234行	γwt'w	β'γβwr	'štyk	m'γh	19	sγtyh
	王	皇帝, 中國之	第三	月	十九	日

總譯: 中國皇帝三月十九日寫此經文於長安城中。或: 抄寫此經於此長安城中時大唐皇帝三月十九日也。

4228
 4225
 4230
 4235

[The page contains approximately 25 line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form of Chinese shorthand or a specific dialect. The text is dense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without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the script. The numbers 4228, 4225, 4230, and 4235 are written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indicating line numbers or folio numbers.]

敦煌本《禪源諸詮集都序》 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

冉 雲 華

一九七三年我因大學研究年假之便，又得到加拿大學會的研究資助，到巴黎去讀敦煌卷子。那年適逢國際東方學者第二十九屆大會，在巴黎舉行，許多我仰慕已久的師友，都在那裏見到，潘石禪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四十年代我在國內讀大學的時候，早就聽到他的大名，直到巴黎聚會，才得當面請益。他對中國文學，漢語文字和漢學的其他許多方面，都是既博又精、功力深厚。後來他又創辦《敦煌學》，在港，臺兩地推動學術研究，使中華敦煌學的探討，踏進國際學苑。他對中國學術的貢獻，和他的學術成就，實在使我佩服。

我對敦煌文物的興趣，雖然遠在五十年代就已開始，但當時只是一般閱讀而已。後來我的碩士論文導師，印度學者師覺月博士，要我幫他整理一下《慧起往五天竺國傳》，才使我初次接觸到第一手的敦煌資料。再後一段時期，因為教書和研究的須要，著手整理中國禪宗思想史的資料；那些資料主要的是來自敦煌卷子。敦煌卷子的內容龐雜，卷帙太多；好卷子固然是翰墨精絕，古意昂然；但是有的卷子卻是殘破不全，字跡滯亂，錯訛累見，不易讀通。我在有困難的時候，常向數位師友請教，潘公就是其中之一。

在潘教授的敦煌研究中，他的大著〈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和影印的《敦煌卷子》，在促進學術研究和發揚「國寶」上，都非常有意義。^①就以我的研究來說，中央圖書館藏第一三三號殘卷，《大乘禪門要錄》特別重要。因為這份殘卷是現存唐代和尚宗密著書目錄和《禪源諸詮集都序》的最早文獻。宗密生於公元七八〇年，卒於八四一年，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有系統和博學的人。潘教授在他寫的題記中，對這份卷子作了這樣的紀錄：

大乘禪門要略一卷 五代 後周 廣順 二年（九五二）寫卷子本 卷下

^① 潘文「題記」，原刊《新亞學報》八卷二期。後來又在《敦煌學》第二輯中發表修訂本。以下簡稱「題記」。潘氏主編影印的《敦煌卷子》，於民六十五年，臺北石門圖書出版。以下簡稱「卷子」。

白紙 九紙 每紙行數字數不等，凡存一百八十餘行。

紙幅參差不齊，首紙幅高約三十公分。

起：「住法界，感而即通，名大覺尊。」

訖：「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後鈔圭峯大師所纂集著，訖「都總二百五十卷圖面。」

卷尾有題記云：「廣順二年三月十日，從京來漢大師智清本上，抄寫大乘禪門要略一卷，不著撰人，五代後周廣順二年釋智清 卷子本」蓋誤。按題記意，智清非寫經人，大乘禪門要錄亦非此卷經名，蓋此卷末紙中有標題曰：「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可證。^②

這份卷子經潘先生指出以後，馬上引起研究禪宗歷史，以及研究宗密和尚人士的注意。日本學者田中良昭首先發表了對這份殘卷的考證；我自己也寫過兩篇短文，都是和這份卷子有關係。^③

敦煌卷子的發現，對學術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這是人所共知的事。這些資料對學術研究有什麼用處呢？一般來說，不出發現佚書，豐富文化傳統；利用早期卷子，校刊現存板本；以具體的事物，證實或改正過去的記載；從文獻資料，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等。

就以佛典而論，神會和尚的遺書，慧超游紀的殘卷，禪宗佚書等等，都是敦煌文獻中所提供的新材料。至於卷子在校刊佛經的價值，早為整理漢文佛教典籍的人士所熟知。在用敦煌卷子材料，開拓學術研究中的新領域上，胡適，鈴木大拙，關口真大，牧田諦亮，柳田聖山等學者的著作，早為學術界的熟知。就以《禪源諸詮集都序》的殘卷來說，它的出現可以澄清中國思想史上兩點重要的問題：一件是宗密對禪藏和禪史編纂的思想和標準；一件是《禪源諸詮集都序》所載的「迷悟十重」，是否和周敦頤（一〇一七～一〇七三）的《太極圖》有關係。

敦煌殘卷《禪源諸詮集都序》出現以前，這本書的板本流傳，可以分為兩個系統：兩卷

② 轉引自田中良昭論文，〈敦煌本『禪源諸詮集都序』殘卷考〉，刊於《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37號（昭54年），第58頁。

③ 參閱上述田中論文，及作者論文〈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刊於《華岡佛學學報》第四期（民六十九年），第一三二～一六六頁，《A Study of Ta-ch'eng ch' an-men-yao-lu: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後者是作者為國際敦煌學討論會所寫論文，將於《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中刊出。

本和四卷本。屬於兩卷本這一源流的有日本延文三年（公元一三五八年）刻本，韓國萬曆四（公元一五七六）年，和崇禎七年的兩個刻本，以及江戶時代日本田原仁龍的和刻本。屬於四卷本系統的有嘉興藏（刊於一六八四年），日本縮刷藏（一八八六年）和大正藏（刊成於一九三五年）等。其他在中國刻印的零星佛經，我見過的也有兩種不同的系統：一是康熙甲辰（公元一六六四年）七月，鼓山比丘道宗募刻的兩卷本；另一個是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金陵刻經處，題為《禪源諸詮集》的四卷本。^④

十多年以前，我曾提出一項結論說《禪源諸詮集都序》，這本書原來可能只分兩卷。四卷本的源流，可能是在一〇六二年，遼國「文士校正」此書時，才改分為四卷，它就是「遼朝崇天太后清寧八（一〇六二）年，印造頒行，天下定本。」^⑤當時我的推測，是根據早期刻本都是兩卷，以及賈汝舟所寫的序文。現在敦煌寫本《禪源諸詮集都序》本文殘卷，文尾寫明「下卷」；卷子所附的「圭峯大師所纂集著…」目錄，也明白記有「兩卷」^⑥字樣。這就使此書原分兩卷之說，被證實為定論。

卷子本《禪源諸詮集都序》的最後一段，也證實了《都序》只是序文而已；所謂「禪藏」就是卷子中所列的《集禪源諸論開要一百三十卷》^⑦。這本劃時代的禪學巨著，一度曾被懷疑為並非實際存在。現在潘先生把這份卷子，重新檢定品題，證實《都序》並非「禪藏」，禪藏實在是另外一部巨著。不過原書現在已看不到了，它究竟是怎樣的一部著作呢？大家還不太清楚。

想要知道「禪藏」的內容，《都序》是主要的線索之一。我在一篇英文論文中曾經指出，「禪藏」亦名《禪那理行諸詮集》^⑧。這一點是宗密自己在《都序》開首中寫下的。現在還可以根據殘卷末尾的數段文字，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卷子本的原文中有一段說：

⑨

-
- ④ 見日本學者鍬田茂雄譯著《禪の語録の：禪源諸詮集都序》（東京：筑摩書房，昭四六年出版），第三七〇頁以下。
- ⑤ 作者論文〈「禪源諸詮集都序」最早印本的發現和證實〉，刊於《東方雜誌》，復刊第八卷第二期（民六十三年八月），第38頁。
- ⑥ 《卷子》，1241頁。
- ⑦ 同上。
- ⑧ 見前註作者英文論文。
- ⑨ 《卷子》，第1239頁下欄。卷子本文直行通寫，引文中的標點符號，是我加的。

問曰：上來所敘三種教、三宗禪、十所以、十別異、輪迴及修證又各十種。理無不窮，事無不備，研尋翫習味，足可修心。何必更集《禪詮》，數過百卷？

這段話中的「何必更集《禪詮》，數過百卷」一語，各版所傳，並不一致。日刻延文版說的與卷子本相同；但是文後有一段小字夾註：「一百六十卷」幾個字。韓刻本讀作「何必更讀藏經，及諸禪偈」。《大正新修大藏經》本，作「何必更讀藏經，及集諸禪偈，數過百卷」。金陵刻經處本和大正本相同^⑩。從這同一段話卻所傳不同的地方看，卷子本最早，所記的事實是清楚明白。延文版的文字與卷子本相同；但是多了一段小字夾註到了大正本和金陵本時，「更集禪詮」已變成「更讀藏經，及集諸禪偈」。這就和宗密編集《禪源諸詮集》時的原意，有所出入了。卷子本和延文本的優越之處，從此也可以看出。

現在再看宗密在編纂《禪源諸詮集》時，遇到了些什麼樣的問題。卷子本說：^⑪

然結集次第，不易倫排。據入道方便，只合先開本心；次通理事；次讚法勝妙，呵世過患，以勸誠修習；後示以對治方便，漸次門戶。

這一段話和雖然直接關係到「禪藏」的編纂，實際上都是宗教思想史上的大題目。所謂「據入道方便，只合先開本心」，就是說如果從宗教哲學上著眼，就應當首先討論「本心」。在宗密的思想中，「本心」指的本體；其他是「用」。宗教哲學的目標是要直達心源，見性成佛；其他只是末節而已。但是這種從哲學著眼的方法，卻和禪宗重視師資承傳的傳統有衝突。宗密也曾想到用思想的角度，去編纂禪藏。但是他馬上意識到以思想為中心編纂方法，會造成歷史問題的混亂。他寫道：^⑫

今所依此編之，乃學師資、韶穆顛倒、文不穩便。具如六代以後，多述一真；達磨大師、卻教四行。不可孫為首部，祖為末篇。

這一段話對不熟悉禪宗思想史的人來說，好像是沒有多大的意思。如果從禪宗史上去著眼，這數行文字卻是禪學思想發展的提綱。禪宗開始的時候，本來就是一種重於宗教實踐的說教。傳為菩提達磨所著的《二入四行論》就不是一部哲學作品。「真心」「本性」的說法，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因之如果要從哲學入手，編纂禪集的話，就會造成「孫為首部、祖為末

^⑩ 參閱前引錄田譯著，第251頁。錄田的書是以韓刻本作底本的。《大正藏》，第48卷，第四——頁下欄。日刻延文本下卷，第十七頁下。金陵刻本，第四卷，第十頁下。

^⑪ 《卷子》，第1240頁，上欄。

^⑫ 同上。

篇」的局面。所以他覺得用思想爲主的辦法，是「文不穩便」。

宗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還是用他自己的文字，作解答罷！卷子本末尾一段文中，有這麼一段話：^⑬

故今所集之次者，先錄達磨一宗；次編諸家雜述；後寫印宗聖教。聖教居後者，如世上官司文案、曹判爲先，尊官判後也。

這就是《禪源諸詮集》的編輯原則和體例：達磨所傳第一，諸家雜述第二，聖教或佛經文字結尾。這就是說在禪宗文獻上，宗密用的是歷史方法，先後依次收錄各家文字的。在結尾一部份，是用佛教說的「聖教」去肯定禪宗教義，從而把禪宗納入佛正統之內的。這是宗密的特殊貢獻，這種方法對東亞禪學傳統，有很大的影響。

他所說的「諸家雜述」，又指的是什麼呢？宗密自己對這一點也有詮解。卷子本的一段文字如下：^⑭

或因修鍊、功至證得，卽以之示人 求那、惠稠
臥輪之類；或因聽讀聖教生解，卽以之攝束（按：應爲眾字） 惠聞禪
師之類；或降其迹而適性，一時間世警營（按：應爲策字） 志公、傅大士、
王梵志之類；或高其節而守法，一國中軌範僧侶 廬山遠
公之類；或其製作，或詠歌志道，或嗟嘆迷凡、或偏讚一門…

從這些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禪源諸詮集》或「禪藏」所包含的內容，不但有禪宗的大師們，同時也有其他和尚，如以義解馳名的廬山慧遠（二三四～四一六），以神異功能而受人重視的寶誌和尚（四一八～五一四）等。

流行本《都序》還告訴讀者說，《禪源諸詮集》雖然內容豐富，包含有禪宗以外的其他文獻；但是那部巨著，仍然是以禪宗著述爲主流的。宗密對於這一點，有所說明：^⑮

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義別者，猶將十室：謂江西、荷澤、北秀、南侏、牛頭、石頭、保唐、宣什及稠、那、天臺等…

這裏的江西指的是洪州道一（七〇九～七八八）。荷澤是神會和尚（六八四～七五八）。北秀是北宗大禪師神秀（六〇五？～七〇六）。南侏是成都智詵（六〇九～七〇二）。牛頭指

⑬ 同上，同頁，下欄。

⑭ 同上，同頁，上欄。文中所講的各家，鎌田日譯本第257～258頁之間，皆有註釋。

⑮ 《大正藏》本，第400頁，中至下欄。

的是法融（五九四～六五七）。石頭是希遷（七〇〇～七九〇）的別號。保唐一派禪法是由無住（七一四～七七四）所創立。宣什也是活動於四川的僧人，他的禪法是和念佛相結合的^⑮。這些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宗派，包括中國中期禪法的全部。詳情可以從宗密其他禪史著作中，看出梗概。

卷子本《都序》末尾一段，還說明《禪源諸詮集》正文之前有「傳序」部份，記載禪宗所傳的天竺祖師。原文說：^⑯

況復尋其始始者迦葉、阿難也。親稟釋迦。代代相傳，一一面授。三十七世有云西國以有二十八祖者，下至傳序中即具分折。至於吾師…

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推測到，《禪源諸詮集》實有其書，卷帙甚大，內容豐富。那部巨著的組織是先有《都序》，接著是「傳序」，然後是「諸家雜述」，記有數近百家分為十室的禪師記錄，再後以鈔述佛經，印定禪門教義，作為總結論。

卷子本《都序》的出現，不但使我們對宗密的宗教歷史思想，和《禪源諸詮集》的內容和組織，有清楚的概念；卷子本還澄清了宗密和《易》經關係的疑案。

最早提出宗密對周敦頤著《太極圖說》有影響，是清代學者毛奇齡（一六二三～一七一六）^⑰。毛氏指出《太極圖說》裏面，有許多字句和宗密所著的《原人論》相同。近人謝壽康在他的《中國哲學史綱要》^⑱，和《朱子及其哲學》兩書中，重提此事，並且以流行本《都序》中，以「○號記淨法十重」，以「號記染法十重」，以白黑交插記述真妄變化之象等為根據，認為是《太極圖》中陰陽消息的先驅。^⑲

這一說法，初看甚有道理。除了毛、謝二氏所提出的證據以外，我們還可以從宗密自己的著作中，知道他對《易》經，頗有研究。例如他在《圓覺經大疏》等書裏面，就曾多次引用過《易》經原文：^⑳

⑮ 參閱印順著《中國禪宗史》（臺北：民六〇年初版印本），第四章，第129～174，及第二章，第七章，第九章等，對禪宗各派的分析。鎌田茂雄著《宗密教學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5年版），第五章，第293～432頁。

⑯ 《卷子》，第1240頁上欄右邊，有「況復…面授」一段。其後粘合錯亂，後文接於第1241頁，第六行起「三十七世」，直至書末。

⑰ 此間大學圖書館，沒有毛書，容後查對。但毛氏論點，仍可以從下引謝書中看到。

⑱ 見謝著《中國哲學史綱要》（臺灣開明書店，民六十五年臺七版），第309～310頁。

⑲ 見謝著《朱子及其哲學》（臺灣開明書店，民五十三年初版），第22～27頁。

⑳ 引自《圓覺經大疏》卷中之一，《續藏經》第14冊，第145頁右上；卷中三，第163頁右下。

其一：

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其二：

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其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從這幾條引文去觀察，宗密所引用的都是和《易》傳的核心思想有關係，都富於哲學意味。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宗密不但對《易》的經、傳文字加以引用；並且對《易》經的第二手資料，也非常熟習。像他在《圓覺經大疏釋義鈔》一書裏，就曾引用過注疏去理解《易》經傳文。例如他在解釋「太極生兩儀」一語時，就引用了《周易注疏》裏的一段話：^②

韓注云：夫有^{兩儀}必始於無^{太極}，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取其之所極，謂之太極。

接著他又引用《周易正義》，對這一段文字，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說：^③

孔疏云：太極者，天地未分之前，混而爲一，卽是大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卽此太極之謂也。混元旣分，卽有天地。故云：太極生兩儀。卽老子一生二也。不言天者，指其物體。下與四象相對，故云兩儀。謂兩體容儀也。

宗密在書中的其他地方，還有類似的引證。宗密生在晚唐，當時韓愈（七六八～八二四）的名氣很大；孔子早已被公認是聖人了。所以宗密在書中，特別注名「韓注」中的韓字，「卽韓康伯也」；「孔疏」中的孔某，「不是夫子，卽孔穎達也，造諸疏也」。^④按三國時代的王弼（二二六～二四九），注解《周易》，未完而歿，後由韓康伯補充了〈系辭傳注〉，成爲《周易注疏》。唐朝開國，提倡文治，孔穎達（五七四～六四八）奉詔撰寫《五經正義》，其中包括《周易正義》，也就是宗密所稱的「孔疏」。韓注孔疏，在唐代都是「官定課本。」

知道和研究過《易》經是一回事，宗密是否對周敦頤著《太極圖》有過影響是另外一回

^② 引自《圓覺經大疏鈔》卷七之上，《續藏經》第14冊，第352頁左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53頁，右下及左上。

事。前面的討論已經說明宗密對《易》經和疏注，都曾研習；而且他從《易》經中的引文，都富於哲學意味。宗密是否對周氏的《太極圖》有過影響，卻是一個大題目，現在還不可遽下結論。但是《都序》一書中淨染十重的黑白符號，是否影響過《太極圖》一點，卻可以敦煌本《都序》殘卷的出現，得到結論。在敦煌本出現以前，四卷本《都序》中，「迷有十重」、「悟有十重」的對照表中，都用黑圓圈代表「迷真」，以白圓圈代表「悟妄」^⑤。兩卷本是沒有黑白圈這種符號的。例如日刻延文本和韓刻本，「迷有十重」的表圖中都沒有圓圈，也沒有「不覺」兩個字^⑥。「覺」（即「悟有十重」）部份，延文本和敦煌本都標明從一到十的字樣；韓本卻沒有這十個號數^⑦。由此可見唐宋時代的《都序》本子，都沒有黑、白圈以象徵「不覺」與「覺」的變化。更談不到對《太極圖》的影響了。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敦煌本《禪源諸詮集都序》，對中國思想史提供了下列數點資料，解決了由於那些資料所引起的幾個問題：第一，宗密撰寫中國禪史和編輯禪宗文獻時的思想內容和原則。第二，《禪源諸詮集》的內容編排的標準及理由。第三，否定了《都序》裏黑圈、白圈對周敦頤《太極圖》有影響的可能性。

一九八六、十二、十九日

於加拿大漢彌敦

⑤ 《大正藏》第45卷，第410~411頁；金陵本卷四，第5~7頁，可作例證。

⑥ 見延文本卷下，第12~14頁。鎌田刊譯韓刻本第233~236頁。

⑦ 見延文本第13冊；《卷》第1238上欄。

敦煌學 第十二輯

編輯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出版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